

第一章

先秦时期镐京、栌阳及 咸阳军事的初起

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姬发在沔水东岸建筑镐京，并设立“三师”，西周建立。后经“国人暴动”和犬戎乱周，西周灭亡。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关中的秦国经过惨淡经营，势力渐强，并不断向东发展。特别是在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和迁都咸阳之后，秦国的军事力量空前强大。秦王嬴政继位后，终于翦灭六国，统一六合，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长达 5 个多世纪大国争霸的混乱局面。

第一节 西周镐京的军事与战争

一、镐京的地理位置及周武王建都的战略思想

西周在建国前后曾建有两座都城：这就是周文王姬昌所建的丰京（今陕西长安沔西乡马王村附近）和周武王姬发所建的镐京（今陕西长安镐京乡落水村附近）。丰、镐二京隔沔水相望，近在咫尺。二都北临渭河，南接秦岭，依山傍水，处在关中平原中部腹地，地形平坦，交通便利，土壤肥沃，河流纵横，物产丰饶。从此，这里便成为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中心，也是西安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两座全国性的大都市。

究竟周文王和周武王为什么要把国都建在这里，丰、镐二京到底具有怎样的战略地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还得从周族人的兴起和逐渐强盛的大致过程说起。

原来周人是兴起于关中西部的一个古老的姬姓部落，最早居住于有邠（今陕西杨凌特区），其始祖弃（即后稷）就发迹于此。传至首领公刘时期，周人又从有邠迁居豳（今陕西旬邑）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大约从这时开始，居住在今陕西和山西北部一带的被称为“戎狄”的少数民族人也向渭水流域移动。因此，周人和这些戎狄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的摩擦和战争，也就接连不断，频繁发生。到古公亶父担任首领以后，由于不堪戎狄的侵扰，便率周人聚族南下，迁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与岐山两县交界之处）并开始营建城郭，修筑室屋，设置官司，组建军队，这标志着周人已粗具了国家规模，正在进入文明社会。大约就从这时开始，周人就与东方大国商朝发生了关系，古公亶父并被商王封为“周侯”，还参加过商朝讨伐鬼方（戎狄的一支）的战斗。

古公亶父死后，子季历继立。这时周人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壮大，逐渐强盛，并多次击败了戎狄的侵扰，成了渭水中游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商王被迫承认季历为西方霸主，故季历遂号称西伯。商王文丁继位以后，鉴于周族已对他的西方造成了严重威胁，便借故处死了季历，^①并下令商的与国崇（在今陕西长安县境内）对周人进行严密监视，这说明周人此时已同商朝成对立之势，以致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立，是为周文王。这时，周人和商

① 参见《孟子·梁惠王》及《左传》昭公七年。

朝的矛盾日益加剧。周文王一方面大力改革内政，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扩充实力；另一方面，又加紧对西北方面的戎狄发动了一系列的主动进攻，相继灭亡了密、邗等周围小国，疆域扩大到了今甘肃东南、山西中部和汉水上游。后来又一举灭亡了商的与国崇。为了巩固这些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并对最后的灭商做好准备，他遂决定迁都于丰，将周人的基地向东推进了 200 余里。

文王死后，子姬发继立，是为周武王。这时在位的商纣王正沉湎酒色，荒淫暴虐，内外矛盾，错综尖锐，已陷于极端困窘之中，濒于崩溃而无暇西顾。周武王即位以后，遂将都城由丰迁至镐京，并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积极备战。四年以后，武王遂大举伐商。牧野一战，商军大败，商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由此可知，周文王的建都丰京和周武王的建都镐京，都是建立在对西北戎狄的防御和对商的用兵这个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的。因为这里北有渭水相隔，戎狄的骑兵不易逾越，渭水遂成了丰、镐二京北面的一条天然屏障。但这里向东都是平坦宽敞的原地，可直通商的别都朝歌，有利于周人的战车行驶。加之这里物产丰饶，既可作为伐商的军事供应地，又可满足作为政治中心的财政开支。因此，周武王父子的建都丰、镐，正体现了他们战略思想的高瞻远瞩和慧眼独具。

二、镐京的军事制度及后勤装备

西周灭商以后，遂按等级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起了一支数量众多而又装备精良的常备部队。这支常备部队包括宿卫京师的部队和驻守各诸侯国内的部队，但无论是京师的宿卫部队还是诸侯国内的驻军都要听从周天子的统一调动，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形成周天子无上权力的基础。

而驻守京师的宿卫军则是周天子亲自掌握的部队，也是西周奴隶主国家赖以运转的柱石。

西周时期驻守镐京（亦称宗国）的军队为“宗周六自”。“宗周六自”字样经常出现于西周金文之中。经研究考证，多数人认为“自”即“师”，为当时西周的最高军事编制，每师约 1 万人，即宿卫京师的部队经常保持在 6 万左右，这应是西周宿卫京师的正规部队。另外，保卫天子的“虎贲”亦有 0.3 万。这样，西周王朝部署在首都镐京的军队总数当有 6.3 万之多，占全国总兵力的 $\frac{1}{3}$ 以上。周武王在伐商之时，所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①，当是宿卫京师的部分兵力。

西周的兵役制亦带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即周天子的“虎贲”大多从“王族”或“公族”的子弟中征集，属贵族子弟兵，故其地位最高。而充当主力部队的“甲士”，则从居住在镐京和附近城邑中的“国人”，即平民阶层中征集，其地位仅次于虎贲。而随同“甲士”作战的“徒兵”和专门从事军事后勤供应和军事工程劳役的“厮徒”则从奴隶中征集，故其地位最为低下。而服兵役的年龄则一般限定在 30~60 岁之间。《诗经·北风·击鼓》篇疏引《韩诗》云：“二十从政，三十受兵，六十还之。”这就是说，凡贵族和平民子弟在年满 20 岁时，就要接受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周王朝在镐京城内设立的“辟雍”，就是专供这些预备役人员练兵习武和接受文化教育的军事学校。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术）则是其学习的主要内容。其中“礼”、“书”、“术”是文化教育的课程，而“乐”、“射”、“御”则是练兵习武的军事课程。因为古代乐、舞结合，乐舞训练既是舞蹈，又是操练兵器的基本功训练

^① 《史记·周本纪》。

形式之一。“射”就是拉弓射箭，“御”则是驾车奔驰。这都是当时的主要兵种车兵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全文中多次有周王在镐京辟雍主持习射仪式典礼的记载，并经常根据射、御技术的高低进行赏罚，这说明周王朝对预备役人员进行军事训练的高度重视。

周王朝对服役兵士的军事训练亦很看重，而这种军训往往通过“大蒐”即狩猎方式进行，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法定制度，定期训练。而“大蒐”则因季节不同而叫法各异：“春为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①但无论何时进行“大蒐”都应包括列队布阵、军前誓师、夜战宿营以及车、徒配合，攻击、退却，将帅指挥和凯旋、献禽、庆赏、处罚等一系列完整内容。这不但会提高部队总体作战的能力，也增长了将帅的指挥才能，从而使部队可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严明的军纪。

西周时期的车兵是军队的主力兵种，车战亦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故战车、战马遂成了驻守“成周六师”的主要军事装备。

西周的战车较商代更为发展。这首先表现为驾车的战马已由商代的二匹增至四匹。《诗经》中有对周代战车描述的诗篇说：“戎车既安，如轻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②大意是描述周王率领四马所拉的车队，北伐玁狁（即戎狄）的威武场面。1955—1957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长安沣西西周遗址中发现了两个西周时期的车马坑，^③又为我们研究西周战车的形制

① 《周礼·大司马》。

② 《诗经·小雅·六月》。

③ 参见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沣西发掘报告》，载《考古学专刊》丁种第12号，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和装备提供了实物证据。据载，西周的战车不但车轮、车厢、车辕的制作更加精细、坚固，体积比前增大，而且还在车轴两端和辕头及衡木两端均安装有颇具战斗性能的兵刃车器，刃薄端尖，可增加战车本身冲撞敌方的杀伤力。

西周对战车的兵力配备亦有严格规定。据汉儒郑玄在《周礼·小司徒》注引《司马法》中有云：“每三百家出革车一辆，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由此可知，西周的战车每辆当配备乘卒和步兵 30 人。但也有人根据汉儒服虔在《左传》成公元年注引《司马法》中“每甸六十四井，出战车一辆，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记载，认为西周每辆战车配置的乘卒和步兵应为 75 人。还有人认为上述记载均为西周时期的军赋制度，而与当时西周战车的兵力配置无涉；并根据《孟子·尽心》和《吕氏春秋·简选》的有关记载，认为西周的每辆战车只配 10 名甲士（即乘卒），而每五乘组成一队，五队为一正编，一百乘为一师，另有两倍于车兵的步卒独立编组，协同战车作战。^① 上述观点虽纷繁歧异，但都说明西周时期的战车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军事装备，乘卒和步兵的相互配合已成为当时作战的主要形式，这一点却是共同的。

随着青铜冶铸业的不断发展，西周的兵器制作技术也大为提高，兵器的生产规模也较前扩大。据有关文献记载，周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司空和大宰之职，专责督理制作包括兵器在内的各种器物，司空之下又有考工，具体掌管“百工”之事，而“百工”则是制作工匠的总称。考古证实，周都丰、镐和周原等地分布着大量作坊，这些作坊中，当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制造兵器的。

^① 参看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上册第 63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西周兵器制造技术提高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不仅对旧有的戈、矛、刀、箭等兵器进行改造制作，使其更加轻便灵巧和锋利尖锐，杀伤力增大，具备了更高的作战能力，如对青铜戈的“胡”部加长，戈“穿”增至 3 至 4 个，从而增强了戈的穿透力和坚固耐用。另外，还出现了如剑、戟等一批新型兵器。

剑是一种锋、刃相兼的手持短兵器，既可刺杀，又能砍削，适用于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亦可作为防身之用。据考古发掘证明，西周时期的青铜剑同后代相比，剑身较短而无脊，且缺少剑格的剑首，多带有初创时期的原始性，但却在兵器种类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对我国兵器制造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

戟是把戈、矛两种兵器的功能集于一身的新兵器，既可直前刺杀，又可后拉勾割。据考古发掘证明，西周的铜戟数量较少，且大多用作仪仗装饰。

三、镐京的城防建设

周王朝十分重视首都镐京的城防建设。虽因年代久远，镐京的城防建设遗址今已很难寻觅，但从有关文献记载可知，镐京城周 9 里（一说 12 里）城墙高约 1 丈，墙上筑有女墙，每面墙洞开 3 门，共 12 门，门外有曲城、名闾，就是重门（后名瓮城）。曲城上部筑台，名闾。城墙四角筑有高出城墙的屏（即城隅，后世角楼之前身）以屏障城墙。墙外环以水濠。城外还筑有城郭。

除了筑城设防以外，周王朝还在京畿地形险要处修筑关门，设置关塞，以控制交通，防止突然入侵。《周礼》中记载的“司关”、“司险”、“掌固”、“掌疆”等就是防守这些关门的官吏。

由于战车已经成为镐京宿卫部队的主要装备，而战车又对

道路的依赖性极大，故周王朝对镐京附近的道路和交通设施的修缮及完备极为重视。据有关文献记载，周王朝曾根据宽度和质量将道路分为“国涂”、“环涂”和“野涂”三种。“国涂”即指首都镐京城内的道路。“国涂九轨”就是说镐京城内的道路宽度可并行九辆战车。每辆战车宽约 8 尺；“国涂”道宽应为 72 尺（约当今 15 米）左右。“环涂”即指镐京城郊的道路，“环涂七轨”就是说镐京城郊的道路可并行七辆战车，宽度当为 56 尺（约当今 12 米）；“野涂”即指遍布关中地区的乡间小道。“野涂五轨”，是说乡间小道可并行五辆战车，宽度当为 40 尺（约当今 8.5 米）。《诗经·小雅·大车》篇有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都镐京附近的道路就像磨刀石一样宽阔平坦，就像箭杆一样笔直近捷。质量如此上乘的道路，自然对军队的调遣和军事情报的传递极为有利。

西周王朝还在镐京通向各诸侯国及边境地区的山头和高岗上设置了一整套烽燧传警的通讯系统，派专人守候，寇至则燃，白昼放烟，夜晚举火，用以传递军事情报和调集军队。相传周幽王为了博得宠姬褒姒一笑，曾在国都附近燃放烽燧而戏弄诸侯，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这说明京都镐京附近亦有烽燧设置。

四、厉王时期“国人”与周王室的镐京之战

西周建立以后，历经成、康、昭、穆和共王等诸王的统治时期，是西周的盛世。特别是在“成康之治”的五十多年间还出现过一段“天下安宁”的太平局面。但从懿王开始，由于内外矛盾相互交织并日趋尖锐，周王朝便开始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到周厉王继位以后，因为宠用佞臣，任非其人，又对山林川泽实行“专利”政策，对广大平民、中小奴隶主贵族以及广大奴隶进行横征暴敛，遂使日益加剧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阶

级矛盾愈演愈烈，致使西周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这里所说的“专利”政策，就是周厉王为了应付日益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违犯周初规定，将原来为大家共有的山林川泽之利收归为王室所有，禁止人们随意进山樵采和下河捕捞，否则，就要向王室缴纳沉重的税收。这就引起了居住在镐京城内多数“国人”的不满。他们由于“财力单竭，手足靡措”，^①便纷纷口出怨言，表示反对。为了压制舆论，厉王遂派卫巫监谤，企图用血腥的淫杀手段，将“国人”的愤怒压制下去。“国人”的怨恨虽暂时受到了压制，但他们心中的不满却与日俱增，“道路以目”，一时竟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但厉王却得意忘形，竟自我夸耀说：“吾能弭谤矣！”这时，有位名叫邵公的大臣向他进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涌必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②但厉王拒不纳谏，仍一意孤行。结果，终于爆发了镐京城内的国人暴动。

有关史书对这次国人暴动的记载过简，只有国人“乃相与畔（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等寥寥数语。但对这些记载进行一番分析，暴动后的国人与宿卫京师的“六师”和守卫王宫的“虎贲”当有一番激烈战斗。只是因为参加暴动的国人数量众多，他们又对自己服役的“六师”和“虎贲”子弟进行离间和策反以后，这些宿卫部队的很多兵士倒戈相向，国人才能冲入王室，厉王只得在部分“虎贲”的护卫下，逃离镐京，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

厉王逃离以后，太子静慌忙逃入召公家躲藏。国人闻讯，又将召公宅第团团包围，必欲将太子静置之死地而后快。召公无奈，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冒称太子，交给国人杀死，这才保住

① 《逸周书·芮良夫》。

② 《史记·周本纪》。

了太子性命。国人便推周公和召公主持国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这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这次国人暴动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摧垮了周厉王的“专利”政策和残暴统治，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周王朝的统治体系，使其日暮途穷，直至最后的土崩瓦解。

五、幽王时期的犬戎乱周及西周的灭亡

早在西周建立前后，周王朝就与居住在北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犬戎之间的战争从未止息。其中尤以鬼方、獫狁等戎狄部落对周王朝的威胁最大，他们经常对周人进行抢掠，并向东南的关中平原不断推进。当周王朝强盛之时，他们虽被迫北移，但从懿王开始，当周王朝国力日益衰弱以后，犬戎便又加紧了对周朝的入侵，并沿泾、渭两水之间的空旷地带，不断向王畿附近推进。周懿王一度被迫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对犬戎的入侵进行回避。周宣王即位以后，犬戎的入侵更加频繁，宣王虽经多次北征，但互有胜负，犬戎的入侵并未受到严重挫折，宣王也仅能筑城防御，阻止其深入而已。

宣王四十六年（前 782 年），周宣王死，其子宫涅继位，是为周幽王。幽王是荒淫而又昏庸的君主，他置犬戎不断入侵王畿的严峻形势于不顾，只知安逸享乐，整天和宠妃褒姒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醉生梦死，纲纪大坏。后来，还在褒姒的挑唆下，企图废掉王后申氏，杀死太子宜臼，将褒姒立以为后，立其子伯服为太子。这就引起了王后之父申侯的极大不满，于是，申侯便派人暗中联络犬戎，密谋攻周。早已对周王朝虎视眈眈的犬戎闻讯，当即应允，并迅速率骑兵大举南下，向周都镐京发起进攻。镐京的城防设施虽固若金汤，但宿卫京师“六师”兵士却军心涣散，毫无斗志。因此，当犬戎南下

以后，途中并未遇到多少抵抗，就顺利地兵临镐京城下。几经攻战，城内守军就作鸟兽散，镐京很快即被攻陷。周幽王仓皇出逃，终被尾随追击的戎兵杀死在骊山脚下。犬戎进入镐京城后，大肆抢掠，城中的财物宝货几乎被席卷一空，宫室、宅舍和所有建筑也被焚烧殆尽。公元前 771 年，周平王宜臼虽在附近诸侯国和锋镝余生的大臣扶助下，即位复国，但由于京师镐京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遂于次年迁都雒邑（今河南洛阳附近），西周亡。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秦都栎阳与咸阳的军事与战争

一、春秋时期秦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与汤杜之战

秦人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嬴姓氏族。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就在东海之滨繁衍生息，留下了重重足迹。西周初年，由于这个氏族的部分成员参与了武庚领导的殷民叛乱，故在周公东征，平定了这次叛乱以后，遂将嬴人强制迁徙到了“西垂地区”。后来，他们便与商朝末年为保卫“西垂”而迁居这里的部分嬴人相互融合，就成了西方最大的一支嬴姓氏族，这支嬴姓氏族就是秦人的直接祖先。^①不久，随着西周边境不断地向西拓展，这一氏族被迫迁至今甘肃天水附近。周孝王时，由于首领非子为周王室养马有功，遂将其封为“附庸”，并准许其在“秦”（今甘肃清水秦亭）建筑城邑，聚族而居。从此，“秦”才成为这支嬴姓氏族的正式名称。后来，随着秦人力量

^① 参看林剑鸣：《秦史稿》第二章《秦人早期历史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

的逐渐增强，在对付戎狄的斗争中多次取胜，故在周宣王时，曾封秦人首领“秦仲为大夫”。不久，秦庄公时期又被周封为“西垂大夫”。公元前 770 年，当周平王东迁雒邑之时，由于秦人首领秦襄公护送有功，遂将“岐以西之地”赏赐给秦，并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并准许其“与诸侯通聘享之礼”。^①这样，秦就由“附庸”而为“大夫”，又由“大夫”而为“诸侯”。至此，秦国便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春秋初期，秦襄公大力整顿武备，也像关东各诸侯国一样，“置三军，设三帅”迅速组建了一支由战车和步、骑兵相结合的作战部队，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并同戎狄展开了争夺“岐西之地”的艰苦战斗。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到秦宁公继位以后，秦人才将领土拓至岐地。为了巩固既得的胜利成果，也为了向戎狄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宁公二年（前 714 年）遂将国都由泾渭之会东迁平阳（今陕西宝鸡东阳平村），并将居住于“汤杜”的“戎人”作为攻击目标。

“汤杜”史书上亦称“荡杜”、“汤台”、“汤陵”等，其王自称为“亳”。关于“汤杜”的地址，由于有关文献记载不一，故有多种说法。《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汤杜”在唐时“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或始平（今陕西兴平），而该书《索隐》引徐广语云，“汤杜”在“杜县之界”（今陕西西安东南）。

笔者认为《索隐》所说为是。因为从这一地名的“汤”字和其王自号的“亳”字分析，这里的居民与殷商有很大关系，很可能是在殷商时即迁居关中的商人后裔所建之邑。而当时的戎狄已遍及关中，特别是渭北地区更是戎狄出没之地，而渭水

^①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秦本纪》。

以南因有渭水阻隔，戎人较少。故这部分西迁的商人只能将“汤杜”作为安身之地，而根本不可能迁居渭北的“三原”或“始平”一带。西周建立以后，为了对这部分商人后裔加强统治，遂将杜伯的封国定在这里。又因为这里是商人后裔的聚居之地，才有了“汤杜”之称。西周灭亡以后，这部分商人后裔遂假冒“戎”人，并与戎狄相勾结，乘机进行复国活动，这就势必会和正在东向发展的秦国发生尖锐冲突。于是，秦宁公把“汤杜”作为攻击目标，也就势在必行了。

《史记·秦本纪》对宁公发动的对“汤杜”的这次战争作了如下记载：“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即汤杜）。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十二年，伐荡氏，取之。”

由此可知，秦宁公这次对“汤杜”用兵，从宁公二年（前715年）开始，至宁公三年（前714年）结束，前后历时一年有余，才终于将亳王击败，占领了汤杜，其战争激烈程度可以想见。但投奔了戎狄的亳王所率残余部队，仍继续与秦为敌，并经常联合戎狄侵扰秦地。这种时断时续的战事一直进行到宁公十二年，“汤杜”之敌才最后被歼灭。到秦武公十一年（前687年）又在这里设立“杜县”这是古都西安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县制。但这时的“县”原意为“悬”，即“系而有所属”之意，明显带有军事性质。

总之，秦与“戎人”进行的这场“汤杜”之战，是春秋时期秦人在军事上取得的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它不仅为秦人后来的东进扫除了最大障碍，而且也为后来秦孝公的迁都栎阳和秦孝公的定都咸阳，举行了一次成功的奠基礼。

二、战国初期秦国势力的东渐及秦献公迁都栎阳的战略决策

从公元前475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直至公

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战国共延续了 250 多年。

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日趋没落，而以大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却代之而兴，而代表这一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也相继登上政治舞台，通过各种形式掌握了国家政权。这种以封建制为核心的社会革命正在席卷着关东六国。特别是与秦毗邻的晋国，从战国初期开始，就已形成了韩、赵、魏三个独立的封建政权，到公元前 403 年又正式被列为诸侯，晋国公室已被彻底消灭。东方的齐国后来也被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田氏篡夺了国家大权。但地处关中西部的秦国却因为独特的奴隶制结构和政权形式以及长期以来“与戎狄同俗”^①等多种原因，故在战国初期仍维持着奴隶制的旧制度，并形成了奴隶主贵族保守势力庶长专权的落后局面，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极大地削弱了秦国的军事力量。故从秦简公二年（前 413 年）开始，首先强大起来的魏国就曾大举攻秦，相继侵占了秦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阳（今陕西大荔西）、郃阳（今陕西郃阳南）等河西诸城，黄河以西的土地多归魏国所有，并于秦惠公十一年（前 389 年）以五万之众大破秦军“五十万众”。^②

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唤起了秦国内部新兴势力的觉醒。公元前 387 年，秦惠公死，秦国内部新旧两大势力终于爆发了以争夺王位继承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结果，新兴势力最终击败了以惠公之妃、秦出子之母小主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将代表新兴势力的秦灵公之子公子连从晋国迎回秦国，立以为君，是为秦献公。献公继位以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 383

① 《战国策·魏策三》。

② 《吴子·励士》。

年，即将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西南）迁至栎阳。

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 25 里之武家屯附近。秦献公迁都以后，就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围筑了一圈夯土城郭，修建了一些宫室宅第。据考古发掘可知，栎阳城遗址东西宽 1801 米，南北长 2232 米，总面积约为 4 平方公里。^① 虽然这座城郭的面积狭小，修筑亦很仓促，明显带有临时迁都的性质，但这里却“东通三晋，亦多大贾”，^② 不仅商业贸易十分兴盛，而且也是东西交通的要冲之地。再加之这里地势开阔，平坦无阻，进退自如，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秦献公迁都栎阳，表现了他不甘僻居西垂，积极东进，以求同关东六国逐鹿中原的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支配下，献公迁居栎阳以后不久，还发布了一系列改革军政的措施。

首先，献公从献公六年（前 379 年）开始，相继在首都栎阳和附近地区设立了栎阳和蓝田（今陕西蓝田西）诸县。这不但标志着首都栎阳军事地位的日趋重要，也为秦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县制作了准备。

其次，献公十年（前 375 年），秦献公又下令将首都栎阳和全国人口按五家为“伍”的单位编制起来，史称“户籍相伍”。^③ 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国”和“野”以及“国人”（自由民）和“野人”（奴隶）之间的严格界限，提高了奴隶的身份地位，促进了奴隶制的消亡和封建制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全体国民都被编制在军政组织之中，扩大了征兵的兵源。由此推想，屯驻于首都栎阳的兵力将大量增加，国力也得到了迅速加强。

① 参看《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载《文物》1966 年 1 期。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献公十九年（前 366 年）开始，秦献公遂派兵大举进攻韩、魏，并多次大败韩、魏联军，接连取得了洛阳（今陕西大荔西）、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和少梁（今陕西韩城南）之战的胜利，使秦军首次深入到了魏国的河东腹地，夺回了河西的部分失地，并迫使魏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

三、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与秦孝公的定都咸阳

秦献公的改革虽对提高秦的国力和加强军事力量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秦国保守势力的根深蒂固和盘根错节，因此，陈旧腐朽的奴隶制度仍没有得到彻底根除，国力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仍受到严重阻碍。同相继完成了封建化过程的关东六国相比，仍显得十分落后，故他们仍把秦同“戎狄”相题并论而予以鄙视。

公元前 362 年，秦献公死，其子渠梁继位，是为秦孝公。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国君即位以后，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①遂决心变法图强，振兴国力。这时，“少好刑名之学”^②的商鞅听到秦孝公“求贤”纳士的消息后，当即从怀才不遇的魏国来到栎阳，并用“强国之术”说服了孝公。秦孝公遂将商鞅任为左庶长，于公元前 359 年开始推行新法，并相继颁布了“垦草令”、“令民为什伍”、“重农抑商”、“开阡陌封疆”和普遍设立县制等一系列旨在革除奴隶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封建经济和建立封建政权的改革法令。为了扩大兵源，提高秦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秦孝公还在商鞅的支持下，发布了以下改革军政的法令：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史记·商君列传》。

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级爵制。即战士的军功只能以在战场上杀敌的多少来进行计算，凡立有军功，均可得到官爵利禄。杀敌越多，军功越大，获得的爵位就会越高。其官爵分为 20 级：即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其中公士为最低爵位，彻侯为最高爵位。爵位有高低之分，待遇也有大小之别。如得爵一级就可役使“庶子”一人，爵至九级的五大夫，就可“税邑三百家”，爵至七级的公大夫就可得到同县令相等的待遇等。虽贵为宗室勋戚，如无军功，亦不得超越规定占据田宅、臣妾。

严禁私斗。即严厉禁止居住在城“邑”的奴隶主阶级为争夺土地、财产和奴隶而经常发生的私自争斗，旨在消除奴隶主贵族的私家势力，维护和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这是与奖励军功相辅相成的一条法令。这些带有改革军政性质的法令发布以后，“乡邑大治”，百姓们均“勇于公战，怯于私斗”，^①极大地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并迅速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从此，秦国走上了日益壮大的道路。

公元前 349 年（孝公十三年），商鞅又说服秦孝公将国都迁至咸阳。这是商鞅变法中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据考古发掘可知，秦都咸阳位于今陕西咸阳市长陵车站与渭城区窑店乡姬家村之间。本世纪 70 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夯土墙、水道、水井、窖穴和三处大型宫殿遗址，^②故知秦都咸阳大致位于此处。这里濒临渭水，北依高

① 《史记·商君列传》。

② 参看陕西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 年 6 期等。